

中国
古典文学
研究史

郭英德 谢思炜
尚学锋 于翠玲
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顾 青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郭英德 谢恩炜 著
尚学锋 于翠玲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3¹/₄印张·550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43.50元

ISBN 7-101-01381-3/I·213

绪 论

自有文学之日起,就有了对文学的研究,尽管一开始是不自觉的、朦胧的和粗率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即使从孔子整理编辑“诗三百”算起,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有二千五百年,可谓历史悠久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即旨在描绘和评述古往今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历史。

有比较才能鉴别,文学研究史是在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的比较中,确立自身的研究对象的。

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比较容易区别。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活动、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而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对象则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学研究家、文学研究著作、文学研究活动、文学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规律。要之,前者着眼于文学家的活动,后者着眼于文学研究家的活动;前者主要是文学家的创作活动的历史,后者主要是文学研究家的学术活动的历史。

然而,要明确地区别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对象,那就相当困难了,因为它们都着眼于文学研究家的学术活动。但这又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不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文学研究史恐怕就会混同于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而失去独立的价值。

既然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研究史都着眼于文学研

究家的学术活动,那么它们三者的研究对象就必然有重合之处。我们认为,它们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交圆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同心圆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三者的研究对象只是在某些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是研究的侧重点和涵盖面却各自不同,是不能互相包容或互相取代的。

例如,历代文学研究家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的批评和总结,历代文学研究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方法,这是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研究史都要涉及到的问题。但是,文学批评史侧重于分析文学研究家具体的批评对象、批评内容和批评方法,文学理论史着眼于阐述文学研究家批评理论的构成体系、内容形态及其演进过程,而文学研究史则旨在描绘和评述文学研究家所涉猎的研究领域,所进行的研究活动,所采用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以及所体现的研究思想和研究观念。

简单地说,文学批评史立足于“批评”,文学理论史紧握住“理论”,而文学研究史则突出着“研究”。无论是“批评”还是“理论”,都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不是“研究”的全部;同时,“研究”也只能涉及“批评”或“理论”的部分,而不可能包括“批评”或“理论”的全部。

最后,文学研究史和文学思想史之间的关系也是双向的。所谓文学思想,既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包括作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因此,文学思想史是文学批评思想、文学理论思想和文学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三者综合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而相对于更多地倾向于抽象的思想演进的文学思想史来说,文学研究史则更多地倾向于具体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状况。如果说文学思想史是上层建筑,那么文学研究史就是基础结构,上层建筑是基础结构的抽象的反映,结构基础则是上层建筑的实体的构成。

另一方面,文学研究史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就是对文学思想的

研究的研究,它要探讨历代人们对文学思想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状况。这更是文学思想史所无法取代的。

现在,我们可以粗略地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这一课题作出“正名”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自古迄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它旨在描绘和评述历代文学研究家对古典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中,所涉猎的领域,所进行的活动,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所体现的思想和观念。

二

我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

这两方面的研究是不能偏废的。因为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都是文学发展的实际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浩瀚深渺的历史长河。倘若我们忽略了其中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展示和描绘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长河,也就谈不上有效地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开拓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了。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界一直专注于对历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而相当忽视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我们虽然也曾有过诗经学、楚辞学、杜诗学、唐诗学、红学等的提出和展开,但显而易见的是,学术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比文学史研究要落后得多。这种现象,从科学研究本身来说,显然未能全面反映古

典文学历史演进的客观状况和整体面貌；从研究现状的要求来说，也影响了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提高与深入。

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历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是极其丰富，相当广博，也颇有深度的，它构成了一个看似庞杂而实则完整的体系，显示出一种与西方文学研究大异其趣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和文学创作史一样历史悠久，成果累累，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遗产。

然而，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历代文学研究的宝贵遗产是相当漠视的。有些研究者崇尚于“向西看”，热衷于以西方思想、西方观念、西方方法为准则，去归纳、评价和衡量中国古典文学。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包括某些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的研究论著，一个很突出的倾向，就是以谈西方文学研究的体系、思想、概念和方法为时髦。人们几乎无暇考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否已经或应该有自身的特色？这种特色是什么？是否已经或应该有自身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什么？它们有着何种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有些论著所汲汲探求的，是怎样用西方文学研究的体系、思想、概念和方法，去理解、阐释、说明、分析中国古典文学独树一帜而又丰富多采的现象。例如，本世纪五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主线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命题的提出和讨论，近十几年来一拥而起的用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诠释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潮，等等，都可以说是“向西看”的产物。

我们并不否认，积极引进国外具有进步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对于我们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展古典文学研究的视角，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的确具有迫切的必要性和切实的可行性。不这么做，我们就将作茧自缚，局限于闭关自守的可悲处境，而无法跨越国界，面向世界，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互相

交流。对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来说，“夜郎自大”决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凝聚着十八世纪以降近二百年文化停滞状态的沉痛事实。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就意味着落后，就要被文化发展的巨浪所淘汰，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化的基础，只能是高度的民族化；失去了民族化的文化，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这就好比一个人只有保持和突显自己的个性特征，才能在社会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倘若他一味地邯郸学步，他就只能失掉自己，成为他人的影子。燕国寿陵的年轻人原来走路的姿态，虽然不如赵国邯郸人那么优美大方，但是完全可以学习邯郸人的长处，对自身走路的姿态加以适当的改进，创造别具一格的姿态美。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竭力模仿邯郸人的一举一动，结果既没有学得邯郸人的走路姿态，反而连自己原来的步法也失掉了，最后简直是爬着回去的。这个故事虽然是庄子虚构的寓言，却包含着十分深刻的生活哲理。

是的，如果我们不去认真地发掘、继承和发扬历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宝贵遗产，以此为基点吸收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研究成果，创造一套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体系，而是盲目地生搬硬套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模仿西方文学研究的路数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那么，我们不正是在邯郸学步吗？这样一来，“反认他乡作故乡”，反而失掉了我们自己。

再进一步看，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应该并且不必要以“向西看”为基点的。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对自身文化深切的认识和热爱，二是对他国文化清醒的体察和理解。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而尤以对自身文化的深切认识和热爱为首要条件。因为，倘若对自身的文化只是一知半解或者弃若敝屣，你拿什么跟他国文化对话呢？

因此,要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创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我们固然要适当引进西方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但首先要探索和总结历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深入了解其特色。首先要认识自己,然后才谈得上学习他人。连自己的本来面目都认识不清,就盲目地模仿他人,这只能贻人以东施效颦的笑柄。

从另一方面看,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后者对一门学科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的。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地总结已有成果,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这种成果总结出越多,越准确,越科学,我们的基础就会越扎实,研究的品位就会越高。对研究者来说,进行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知识的准备和积累要更充分、更丰厚。他不但要有一般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知识,更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还要有文献学方面的修养,包括版本学、目录学等专门的学问。研究者对自己有更严格、更广泛的学识上的要求,他的知识准备更充分、更丰厚,这必然促进学科研究在整体上向高层次的发展。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同研究大家如王国维、鲁迅、胡适、顾颉刚、郑振铎、陈寅恪、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渊博学识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而且,一门学科对知识的要求越高,它就越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也就越具有更大的研究潜力。就古典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开展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克服近几年来颇为流行的主观臆断、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等不良学风,这对整个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史料性,容不得半点的虚伪和狡诈,只有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无愧于当今时代的成绩。

本书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一次尝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作整体的、系统的、详尽的描绘和评述,至今还是

中国学术史上的空白。本书有志于填补这一空白，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探索和总结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

三

那么，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我们觉得，至少有这么几点是比较突出的。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和中国文学发展史一样，是中华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

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因此，相对于世界上其它国家来说，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产生得早，独立得早，成熟得也早，而且一直未尝中断过，它所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这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发端于先秦。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公元三至六世纪，随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就基本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趋向于成熟了。而在西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要到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成型。

正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古典文学学术史蕴含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成为这种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的重要表征。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当文人们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如司马迁所谓“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安书》，《文选》卷41），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在他们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中，就不仅

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而且囊括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追求。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一样,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因此古典文学学术史无疑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古典文学学术史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占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它和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不但决定着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特出风貌,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构成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展开是由中国特殊的文学观念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它促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开放型、宽泛型结构。

在西方,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开始,就运用科学分解的逻辑方法,精确地确定文学艺术在人类浩瀚的知识天地中不可移易的位置。而在中国古代,运用“文”、“文章”或“文学”等概念的时候,都并非精确无误地指称西方或现代意义的“文学”,其内涵既有着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其外延也有着相当大的可伸缩性。一般地说,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广义的文学可以包括哲学、史学等所有书面著作,几乎相当于精神文化的代称;狭义的文学,也往往包括各种属辞运思、稍具文采的诗词文章。比起我们今天用“文学”一词称定具有形象性、抒情性或虚构性等特征的语言作品来说,古代所谓“文学”无疑要宽泛得多。

这种“大文学”、“泛文学”的观念,也许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整体性、混合性的原始思维方式,伴随着中国原始社会宗法血缘关系的递传,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另写专文来谈的。本文要想说明的仅仅是,这种“大文学”、“泛文学”的观念对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

广的影响。这首先在于它促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开放型、宽泛型的结构，犹如陆机《文赋》所说的：“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葛洪《西京杂记》所说的：“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学既然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自然之道，旁及天地万物，同时使天人相互沟通的精神文化现象，文学研究又怎能不包罗万象，涵泳古今，俯仰天地呢？

这种开放型、宽泛型结构，首先表现在古典文学研究几乎将古代一切有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它的视野中，几乎没有什么纯文学和泛文学的严格区别，纯文学的基本特征如讲求抒情和辞采、具有审美价值等，完全可以而且必然要渗透、贯穿到泛文学中去。于是，诗词骈赋、戏曲小说固然是文学，策论表奏、箴铭诔赞、碑碣志状、笺记书信等等也无不可以是文学，——关键不在于它是什么文体、有什么功用，而在于它是否讲求抒情和辞采等文学特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不是强调文学的纯粹性、排他性，而是强调文学的包容性、根本性，为文学提供更有力的存在根据，这正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突出特色。

这种开放型、宽泛型结构，还表现在即便是对纯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时，人们也从不采取封闭式、内敛式的研究方法，而是偏好开放式、外向式的研究方法。在历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有一个渊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把作品文本和作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等统统打成一片，融汇贯通，作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因此，文学研究就必然地和其他各个学科，如哲学、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等等，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在“大文学”、“泛文学”观念的制约下，古代文学研究和

经学研究、史学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在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内部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而且始终是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浅显的例子,如《诗经》首先是经学研究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对象;《史记》首先是史学研究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对象;而注疏方法原本是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后来才引入文学领域,文学文献研究一直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基本材料,除了传统的诗文评以外,应当特别注意从历代的经学研究、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的成果中勾稽、发掘和整理。研究材料的特殊性,也使得在文学研究独立、成熟以后,经学、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也成为文学研究中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渗透的基本方法,促进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例如,经学研究强调“述而不作”,即注重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补充和发挥,而不提倡另起炉灶,自创新说。影响所及,在文学研究中,对经典著作的阐释、补充和发挥就格外发达,而自立一说却不多见。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往往是在述旧中创新,在论古中标今的。

再如,“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作家研究的一大特点,它更具有史学色彩,因为自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作家传记的研究方法以后,为历代文学家立传、作年谱,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把文学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和人际交往中,来考察他的思想、行为和创作,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卓有成效的传统。

又如,“疏不破注,注不破传”是文献学研究的一大准则,它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广,至今不衰。人们对文学著作的文本习惯于采取一种近乎神圣的看法,力求以注疏方式阐发

其内在的含义。特别是对一些视为经典的著作,如《诗经》、楚辞、陶渊明诗、杜甫诗、唐宋八大家文、《西厢记》、《琵琶记》、《水浒传》等,历代有无数的学者耗费了巨大的心力加以整理、校注和评点,乐此不疲。这种研究格局,好处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精雕细琢的研求,但也不可否认有流于繁琐细屑之弊,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古典文学研究中,经学的、史学的和文献学的研究,远远比单纯文学的研究,成果要丰富得多,成就也要突出得多。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利弊得失,与历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第四,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学术始终依附于政治教化,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就往往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

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往往是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是政治教化的有力武器;或者本身就是政治教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政治性的文化。政治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并在道德、宗教、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中肆行弥漫扩散。《史记》卷130引述司马谈的话,说得十分明白:“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政治者也。”先秦诸子无一不指归政治教化,这怎能不成为后世一切学术文化的楷模呢?特别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君临天下的学术思想,二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的意识观念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染和熏陶,因此,儒家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念不能不强制有力地制约着历代的古典文学研究,成为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主导观念。

在西方中世纪,教会把一切学术都纳入神学的范畴,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科学是“宗教的仆人”,这同中国古代把一切学术都纳入政治教化的情况颇为相似。但是中西方的学术发展有一点根

本的区别,那就是:在西方,真正的学术研究总是以冲破神学的束缚,寻求自身独立自由的天地为起点和终点的;而在中国,学术研究却始终笼罩着政治教化的圣光,并以此为荣耀,以此为正道。

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在它的演进历程中,总是受到当时的政治氛围、政治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并且在社会政治教化舞台上扮演着特定的角色。例如,汉朝“以孝治天下”,特别讲究政治道德教化,所以对《诗经》的评论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教色彩。从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比较通达的见解,到《诗大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赤裸裸的标榜,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思想的萎缩,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道德教化的需要,反映了汉朝统治者对于古代文化遗产的功利要求。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唐初对南朝新体诗的贬抑,宋初对晚唐五代萎靡文风的矫正,明初对文学的载道明理功能的极端提倡,等等,都是为着巩固新政权的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

古典文学学术史对政治的这种强烈的依附性,造成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了学术研究的现实性和实用性,在中国古代那种纯粹象牙塔里的学问是很少的,也是价值不高的;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超越性,限制了学术研究多向度、多层面的深入发展。但是不管怎样,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这种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总是它的一个不可抹杀的特色,使它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独具风貌。

第五,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在文学研究的表述方式、操作方法和成果形式上,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形态。

首先,在表述方式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往往注重领悟和感受,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经验性。这首先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古人面对一个事物,不愿意对它进行掰开揉碎的分析,以为这么做就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不可能真正地把握事物;而只有对事

物作整体的直观,才能与事物融为一体。换句话说,对一个事物的真正深入的研究,不在于对它的分析、归纳、演绎,而在于对它的静观、感受、领悟。因此,中国古代总是把文学现象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律动的有机整体,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把握对象的整体生命,而文学研究的表述方式当然也就是直观式的、领悟式的。其次,这也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侧重点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既重视“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等文学现象或文学事项,即所谓“六观”,但更重视“批文以入情”、“视文辄见其心”(并见《文心雕龙·知音》),强调对作品的生命体验,因而要求对作品做出一种总体的直接感受性的领悟、概括。相比较而言,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因此整体的直观领悟方式就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这种整体的直观领悟的表述方式,表现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就是用审美的艺术思维方式去进行文学批评。古人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时,很少作分肌擘理的解剖,而是或运用总体的感觉判断,或采用形象化的描述,或借助相类似的意境,或直接抒发自身的感想,来表达对作品的总体感受,从而引导读者步入文学作品的艺术堂奥。即使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笺注,古人也常常不作详细的解释,而是采用旁敲侧击、举一反三的方法,或者罗列典故出处,以说明字词的含义;或者引用其它作品的片段,来申发语句的意蕴。总之,在古代的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也是美感创造的参与者,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感觉、经验、想象参与文学作品美感的建构。所以,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强烈的艺术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艺术。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一个优良传统。

其次,在操作方法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出外部形态的多样化和内部形态的单一化的奇妙组合。这方面,表现了古代学术史领域一个几乎带根本性的弱点。在外部形态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的操作方法无疑是丰富多采的：有的是一语破的的名言隽语，如“诗言志”（《尚书·尧典》），“《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等等；有的是精雕细刻的考证笺释，如《诗经》注，楚辞注，《文选》注，杜诗注等等；有的是因人、因文而发的品评赏鉴，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钟嵘的《诗品》，钟嗣成的《录鬼簿》，以及数以百计的诗话、词话、赋话、文话等等；有的是有感而发、随文标注的评点文字，如各种各样的戏曲、小说作品；有的是文学作品的总集、选集、别集的辑录、遴选和编辑；有的是漫无统纪或稍加编排的随笔杂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操作方法的多样化，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是很有特色的。但是，所有这些操作方法基本上都是被大致相似的文学观念所支配的，这种文学观念就是由“诗言志”、“感物吟志”、“思无邪”、“兴观群怨”等几条主干构成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所以，这些操作方法在内部形态上大都是单一的，给人以千人一声、万众同响的感觉。

再次，在成果形式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往往较为零散，而缺乏系统性。象《文心雕龙》、《原诗》、《闲情偶寄·词曲部》这样自成系统的文学研究著作，在中国古代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文学研究著作是随思、随感、随录的札记体文章，散见于文学家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眉批、笺注等形式之中，有的甚至隐含于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哲学著作或史学著作之中。象《文选》、《文苑英华》、《文章正宗》、《文章辨体》、《唐诗品汇》、《古诗归》、《唐宋八大家文抄》、《古文辞类纂》等文学作品总集，虽然表面上自成系统，内在主要的研究形式却无非是注疏评点式的，在整体上仍缺乏系统性。这种只言片语、散金碎玉式的文学研究成果形式，实际上是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的结果，也是随感式、自娱型的研究方法的产物。而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有机体系，就深藏于这种零散纷杂的成果形式中。

直到五四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现代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这种形态上的特色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随着思维方式的变更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大量思辨性、系统性的文学研究论著问世,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传统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影响,由于传统研究方法根深蒂固的势力,时至今日,直观性、随意性、零散性的古典文学研究还随处可见,具有较强的思辨性、系统性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仍屈指可数。有人说迄今为止的古典文学研究仍然处在“前科学”阶段,这种论断不一定准确,但联系传统的研究模式,我们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第六,与以上一点相联系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发展形态,与西方文学研究离心性、波浪型的发展形态不同,基本上是一种向心性、累积型的发展形态。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学研究的历史,是不同的研究者各自以其不同于前人的理论基点为依据,构成面貌各异的研究体系,“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则是不同的研究者拘守共同的理论基点,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领域展开对象一致或本质相同的研究,共同构筑完整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的历史。

这种发展形态上的向心性、累积型的特点,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得到了细致入微、玲珑剔透的雕琢,如文学资料的考证,作家风格的品评,作品意蕴的涵泳,艺术创作的甘苦,文学本质的体认,等等。但是从整体上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气度尚欠阔大,格局仍显狭窄,方法未免因袭,领域有待开拓。学术史发展的这一特点,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体认到,研究观念对前人的突破与持续不断的更新,对学术的进展,有着何种决定的意义。

古典文学研究进入现代的历史,从某一方面说,正是观念更新的历史。本世纪二十年代古典文学研究得以面目一新,是与五四时